



高等院校“十三五”规划教材

# 中国近代史纲要



赠教学课件

卢翰 周荣居 张爱华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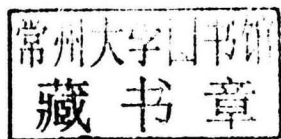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高等院校“十三五”规划教材

# 中国近代史纲要

卢翰 周荣居 张爱华 主编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近代史纲要 / 卢翰, 周荣居, 张爱华主编. --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7. 11  
高等院校“十三五”规划教材  
ISBN 978-7-5647-5255-2

I. ①中… II. ①卢… ②周… ③张…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K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4796 号

## 中国近代史纲要

卢 翰 周荣居 张爱华 主编

策划编辑 谭炜麟

责任编辑 谭炜麟

出版发行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成都市一环路东一段 159 号电子信息产业大厦九楼 邮编 610051

主 页 [www.uestcp.com.cn](http://www.uestcp.com.cn)

服务电话 028-83203399

邮购电话 028-83201495

印 刷 北京荣玉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1.25

字 数 253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7-5255-2

定 价 33.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言

PREFACE

尊重历史,学习历史,有助于认识现实,有助于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凝聚力。忽视历史,忘记历史,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不论时代怎样前进,社会怎样发展,总不能割断历史。“以史为鉴”“鉴往知来”,不失为发人深省的历史名言。

中国近代史,是社会动荡剧烈,国内外矛盾和斗争复杂尖锐的历史。在这个历史时期里,充满了侵略和反侵略、压迫和反压迫、变革和反变革、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近代的中国历史,既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一部苦难史,又是一部斗争史和光荣史。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当代,在凝聚中国力量、实现中国梦的当下,我们应该比较系统、比较全面地学习和了解中国历史,“以史为鉴”,从历史尤其是近代史中得到启迪和智慧,以更好地创造和书写新的历史。

本书按照目前我国史学界所公认的传统划分方法来划定中国近代史的起讫年代,即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1919年五四运动为止,在吸取有关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前的中国近代历史进程。本书内容按照大事件分章编节,共计七章,依次阐述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与洋务运动,中法、中日战争,维新运动与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与清政府的覆灭,新时代的曙光等内容。本书既适合历史专业本专科学生做教材使用,也可做史学爱好者的参考。

在编著过程中,我们借鉴、参考和引用了国内外的相关成果,在此谨对这些成果的著作人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和敬意。由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妥和错误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使之日臻完善。

编者

2017年11月

#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的开端/1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 /2

第二节 鸦片战争与中国人民的抗英斗争 /13

第三节 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1

## 第二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与洋务运动/33

第一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 /34

第二节 洋务运动 /44

## 第三章 中法、中日战争/62

第一节 中法战争 /63

第二节 中日甲午战争 /70

## 第四章 维新运动与义和团运动/80

第一节 资产阶级维新运动 /81

第二节 义和团运动 /97

## 第五章 辛亥革命与清政府的覆灭/112

第一节 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状况 /113

第二节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 /122

第三节 同盟会及其领导的革命斗争 /131

第四节 辛亥革命的胜利与失败 /141

第五节 辛亥革命前后的文化发展 /151

## 第六章 新时代的曙光/160

第一节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经济与社会 /161

第二节 新时代的曙光 /166

参考文献

#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 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 内容提要

本章主要讲述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的发展、第一次鸦片战争与中国人民的抗英斗争、葡萄牙侵占澳门、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变化、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的兴起等内容。

### 重点提示

1. 清朝闭关锁国的历史后果。
2. 林则徐禁烟、抗英斗争的历史评价。
3. 三元里人民武装抗英斗争的历史意义。
4. 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重大影响。

##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

### 一、清朝统治的衰落

中国封建社会经过漫长的发展,到鸦片战争前已处于衰落的晚期,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正循着中国历代王朝的旧轨道,经过“康乾盛世”进入危机四伏的“衰世”。

**经济方面** 封建土地制度依然是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掌握在少数皇室、官僚、地主手里。地主阶级通过高利贷、购买、强占等手段巧取豪夺,大肆兼并土地。土地高度集中的情况在乾隆年间就已经开始严重起来,到鸦片战争前夕,则更趋严重。皇帝本人就是最大的地主,据 1812 年(清嘉庆十七年)统计,嘉庆皇帝直接间接掌握的土地竟达 83 万顷。乾嘉之际的权臣和珅就占田 8 000 余顷。道光年间的大官僚琦善则占有土地 25 600 余顷。占全国人口 80% 以上的农民只有很少的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仅及耕地面积的 10% 左右。龚自珍(1792—1841)描绘当时景象说:“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这反映了土地兼并的惊涛骇浪吞噬了一批又一批的自耕农,把农民逼进了衣食无着的绝境,同时也加剧了满汉贵族官僚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之间的矛盾。

地主对农民的地租剥削十分苛重。佃户终岁辛劳,地主则“安坐而收其半”。农民得将收成的一半,甚至 60%~80% 作为地租交给地主。此外,农民还必须承担政府沉重的赋税,除“正赋”外,农民还受层层官吏胥役各种私派的敲诈勒索,造成“私派倍于官征,杂项浮于正额”。龚自珍的“国赋三升民一斗”的诗句就是对当时民瘼的深刻写照。

繁重的地租、税赋、劳役和高利贷,使广大农民陷于极端贫困、卖妻鬻子的悲惨境地。他们不但无力改进生产技术,无法扩大农业再生产和发展家庭手工业,而且常常连简单再生产也很难维持,社会生产的发展陷于停滞的落后状态之中。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依然在社会经济中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粮食和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产品。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耕织结合的经济结构正是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

但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开始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明朝中叶以来,南方沿海沿江的一些省份,出现了以雇佣关系为基础的手工业工场,到鸦片战争前,在丝织业、制瓷业、棉纺织业、采矿业、冶铁业等行业中手工工场有较大的发展。如丝织业仅南京一地,道光时“缎机以三万计,纱、绸、绒、绫不在此数”,手工工场的规模“有开五六百张机者”。棉纺织业历来是与小农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主要手工业,手工工场发展也颇为普遍,根据 1833 年一个外国人的记载,在广东佛山镇有较多的织布工场,从



事织造各种布匹的工人共约 5 万人,产品需求紧迫的时候,工人就大量增加。工人们分别在大约 2500 家织布工场做工,平时每一工场平均有 20 个工人。制茶业手工工场的发展也较突出,道光年间福建瓯宁一县之内,不下千家,大的手工工场百余人,小的数十人。广州附近的一家规模很大的制茶工场,男女童工达 500 人。规模更大的是采掘业的手工工场,广东佛山一个炉场包括采掘、烧炭、冶炼,有工人上千人。江西景德镇是全国制瓷业中心,“周袤十余里”,“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借此食者甚众”,雇佣工人按季按年发给工资。生产的瓷器行销全国,还远销国外。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和发展说明中国正循着社会发展规律,向资本主义方向缓慢地前进。但是在清政府“重本抑末”政策的摧残下,这些资本主义萌芽还只是沉浮于汪洋大海中的几个孤岛。直到鸦片战争前夕,这个萌芽始终没有发展成为破坏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独立力量。

**政治方面** 清朝封建君主专制政权,弥漫着腐烂的气息。道光帝(1782—1850)专横独断,虚骄自大,一群封疆大吏闭塞愚昧。他们对世界形势茫然无知,许多人甚至不知道英国在天南还是地北。魏源(1794—1857)有诗对此作了辛辣的讽刺:“为问海夷何自航?或云葱岭可通大西洋。岛夷通市二百载,茫茫昧昧竟安在。”面对迫在眉睫的外国侵略,君臣们仍自以为“大皇帝君临万国,恩被四表,无论内地外夷,均系大皇帝百姓”,还在做“天朝上国”的美梦。

与此同时,吏治日益腐败不堪。当时的大小官僚都“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由所遭者,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以定衣钵相承,牢结而不可解”。参与大政决策的枢臣,只是些因循守旧、苟且偷安的老朽官僚,在嘉庆、道光年间久任要职的军机大臣曹振鏞对讨教官运亨通之道的门生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多磕头少说话”六字是当时官僚们奉行的金科玉律。吏治黑暗,贿赂公行。乾隆后期军机大臣和珅就是有名的大贪官,嘉庆时抄没其家,将其全部财产编列为 109 号,其中 26 号经估计即值 22000 万两。“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民谚,是对当时吏治败坏,几乎无官不贪的生动写照。

**军事方面** 突出的是军制落后和军备废弛。清政府每年耗银 2000 万两豢养的 22 万八旗兵和 66 万绿营兵也逐渐腐化。八旗军队变成享有特权的、养尊处优的寄生阶层。绿营兵亦因承平日久,暮气日深。武官只知吞饷肥私,不管营务;兵卒则扰民劫财,从不操练。武器装备落后,大量的是弓箭、矛戟、刀斧等原始武器,少量的是火绳枪、滑膛炮等老式火器。至于“沿海水师,率皆老弱无用”,所用战船,很多是以“薄板旧钉”制成,遇击即破。海防要塞的大炮,有的还是 300 年前的旧炮,有的大炮团铸造时偷工减料,蜂眼很多,施放时经常炸裂。如此腐败的军队,除了骚扰残害人民外,已经失去了抵御侵略、保卫国防的能力。

**文化思想方面** 清朝统治者实行严厉的文化专制政策,以巩固封建专制统治。大兴文字狱,用高压手段消灭反清意识,钳制异端思想。他们竭力提倡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程朱理学,规定科举考试以朱熹集注的“四书”章句为准则,使理学成为正统的官学,并以八股取士的制度和功名利禄,诱使知识分子终日去揣摩八股程式,埋头于朱注“四书”。

清朝统治者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把知识分子的思想严密控制在纲常名教、忠君媚上的模式中,任何违反伦理纲常的思想都被视为“离经叛道”、“非圣无法”。整个文化思想界呈现“万马齐喑”的局面。

由于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日益严重,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农民起义连绵不断。1796—1804年的白莲教大起义,先后有数百万农民参加,波及湖北、四川、河南、陕西、甘肃五省。清政府动用了它所能调动的全部军队和地主武装“乡勇”,用去了2亿两白银,最后才将这场起义镇压下去。

1813年,天理教(白莲教支派)首领李文成在河南滑县发动起义,直隶、山东、河南三省纷纷响应。直隶天理教首领林清率领一支起义军,以太监为内应,一举攻入北京紫禁城,至今隆宗门匾额上还遗留着起义者射出的一支箭头。这次起义虽被扑灭,但极大地震撼了最高统治者的殿堂。

## 二、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殖民扩张

正当清朝国势日趋衰微的时候,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却非常迅速。

### (一) 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

**英国** 英国在1640年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第一次在欧洲的一个大国推翻封建统治。而后,资本主义势力与封建势力经过半个世纪的反复较量,才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和资本主义制度。1785年瓦特改良了蒸汽机,英国出现“工业革命”,机器工业逐渐取代工场手工业,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急剧变化,工业生产的发展突飞猛进。从1770年到1841年的70年间,英国棉纺织业用棉量增加了100倍。交通运输业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铁路和轮船等现代交通工具开始普遍使用。煤、铁等其他工业产量也迅速增加。据统计,1820年英国工业生产量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50%,英国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8%;1839年,英国的煤产量是法国、比利时、普鲁士三国总和的3倍;1840年,英国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5%,生铁产量达139万吨。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

**法国** 法国于1789年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1830年工业生产应用蒸汽机650台,1839年增至2450台;从1815年到1840年,棉织品产量增加了3倍;从1814年至1840年,生铁产量由10万吨增加到35万吨。法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

**美国** 美国于1776年7月4日发表“独立宣言”,在反对英国殖民战争胜利的基础上,在美洲建立了第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19世纪初期,美国比英、法落后,资本主义经济还很弱小,奴隶制度在南部还占统治地位。1820年,美国的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5/6,只有1/6的人口从事工商业和其他职业。美国起步虽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它的农业机器生产数量迅速超过欧洲各国。至1850年,铁路总长达1.5万公里,居世界第一。

**俄国** 俄国是一个长期处于封建农奴制的国家。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它开始了原始资本主义积累的过程,18世纪后期出现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19世纪初开始在棉织业中使用机器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直到19世纪前半期,封建经济仍占统治地位。

## (二) 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

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暴力和掠夺。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开始寻找新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市场,开拓更为广阔的殖民地。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和发展。

**英国** 以英国为首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早就对中国及东方各国怀有野心。16世纪末,英国殖民势力开始侵入印度,并于1600年建立东印度公司,以垄断东方贸易。之后,英国又对阿富汗、波斯、缅甸、印尼等国进行侵略渗透。1637年,英国兵舰四艘驶抵中国广东,不顾明朝政府的禁令,竟然闯入珠江,炮击并占领虎门炮台。中国军民坚决抵抗,击退侵略军。1793年,英国以祝贺乾隆皇帝80寿辰为名,派遣马嘎尔尼率使团来华,提出开放宁波、舟山、天津等地为商埠,割让舟山附近的岛屿与广州附近的地方,减轻税率等侵略要求,遭到清政府的拒绝。尔后,英国兵船多次侵扰我国东南沿海。1825年,英国爆发了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了摆脱危机,英国资产阶级更加紧推行殖民扩张,一些侵略分子不断公开鼓吹武装侵略中国。1832年,英船“阿美士德”号窜到中国沿海测量港湾航道,调查港口情况,并绘制地图。1836年,英国政府代表、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扬言要用武力对付中国。

**法国** 法国在亚洲的侵略目标主要是越南和中国。1640年,法国开始对华贸易活动。法国在打开商品市场的同时,特别重视利用宗教作为侵略工具。1660年,法国成立了中国公司。随后,不断派遣传教士来华。1698年,第一艘法国商船抵达中国,其中就有一批传教士随船而来。法国的天主教传教士私人中国内地者日益增多。19世纪30年代,法国工业进一步发展起来,因而也加紧向外扩张势力。

**美国** 美国在独立之后就极力向海外伸展势力。1784年,开始与中国通商,其对华贸易的开展较其他国家虽晚,但发展很快,商船数由1789年的15艘增至1832年的62艘。1835年,美国组织东印度洋舰队,执行其对远东的“炮舰政策”。

**俄国** 沙皇俄国本来同中国并不接壤。16世纪下半叶,沙俄越过欧亚交界的乌拉尔山,迅速向东扩张。17世纪中叶,武装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和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沙俄的侵略行径,遭到中国军民的抵制和反击。1689年,中俄两国经过平等协商,订立了《尼布楚条约》。1727年,中俄双方又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这两个条约规定了两国东段和中段边界。东段以外兴安岭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界,肯定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中段以西起沙宾达巴哈、东至额尔古纳河(这段边界目前大部分为蒙俄边界)为界。清代我国的西部疆界在巴尔喀什湖,自18世纪初叶

起,沙俄侵略者不断侵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我国领土,相继吞并了西部哈萨克和北部哈萨克。与此同时,沙俄还对我国进行经济掠夺。在鸦片战争前的一个较长时期内,沙俄在对华贸易方面,比其他欧洲国家处于有利的地位。

西方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疯狂的殖民扩张,使古老的中国面临着一场空前的挑战和危机。

### 三、中英贸易与鸦片走私

#### (一)17—18 世纪的中英贸易

中外贸易开始于 16 世纪,贸易数量是极微小的。这时西欧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掠夺殖民地成为积累资本的一个重要手段。最先来到中国的是葡萄牙人,此后是西班牙人、荷兰人,17 世纪初英国人、法国人也接踵而至。早期西方殖民者是集商人与海盗于一身,普遍地采用欺骗讹诈和武力掠夺的手段骚扰中国沿海地区。1557 年葡萄牙人侵占了我澳门,1624 年荷兰人强占我国台湾南部(1661 年郑成功把荷兰侵略者赶出台湾),1626 年西班牙人侵占台湾北部;1637 年第一支英国舰队(共四艘船)闯到广州(珠江口),炮轰虎门,揭开了中英关系的序幕。掠夺、谋害及经常诉诸武力,为欧洲国家与中国开始贸易的特色。

18 世纪时,葡、西、荷等老殖民主义国家相继衰落。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英国发展很快,势力蒸蒸日上,英国东印度公司于 1715 年在广州设立商馆,中英贸易趋于经常化。从此,贸易额扶摇直上。到 18 世纪中叶起,英国对华贸易总值已超过欧洲各国对华贸易的总和。到 18 世纪末,英国对华输入值上升为 90%左右,从中国输出值上升为 70%左右。处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企图用“商品重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占领中国市场。

当时,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主要是呢绒、棉布等棉毛织品,少量的铅、锡、铜等金属品以及从印度转贩的棉花,其中棉花占入口货价一半以上。中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茶叶、生丝、土布、大黄等农副产品,其中茶叶的出口高居首位,约占出口货价的 60%;其次是生丝,约占 20%。

在迅速增长着的中英贸易中,中国一直是出超,英国处于不利地位。英国的王牌商品呢绒等毛织品在中国市场上销路不大,有时还得亏本减价出售。19 世纪 30 年代棉织品开始大量输入,但也打不开中国市场。英国输华商品滞销的经济原因是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于外国工业品有着顽强的抵抗力。广大农民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过着“男耕女织”的贫困生活,他们生产自己需要的一切生活必需品,穿的是自己纺织的结实的土布。因此英国的呢绒、棉布不会有多大的销售量。

英国输华商品滞销的政治原因是清政府对外关系采取闭关政策。

第一,闭关政策是封建自然经济的产物。清朝封建专制政权是建立在小农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下,商品生产和国内市场的商品交换得不到充分

发展,对外贸易更属可有可无,封建统治者把对外通商看作是对“化外之人”的恩赐。

第二,闭关政策是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的产物。18世纪后期,中国封建社会已处衰敝的晚期,清政府亦已开始由盛转衰。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再加上异族统治,与国内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反清起义风起云涌。因此当西方殖民者以商品来叩关时,清朝封建统治者深恐“外夷”与他们诬为“内匪”的人民群众接触,将会危及他们的统治。所以筑起一道隔绝中外的堤坝,使中国人民处于封闭状态,以巩固其封建统治。

第三,闭关政策是清政府对西方殖民者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海盗式骚扰的抵制,特别是因19世纪初以来日益严重的鸦片武装走私而强化了这项政策。

闭关政策的主要内容首先是一口通商。清初,清朝统治者为了断绝东南沿海郑成功等抗清武装的物资供应,厉行“海禁”,下令不许片板下海,不准片帆入口。清政府统一台湾后,于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开放海禁,准许广东澳门、福建漳州、浙江宁波、江南云台山(今连云港附近)四口对外通商。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以后由于英国等殖民者在中国沿海的种种骚扰活动,中外纠纷日益增多,因此清政府下令封闭江浙闽三关,只准广州一口对外贸易。

其次是“公行”制度。外商来广州贸易均需通过“公行”进行。公行俗称十三行或洋行,是由清政府批准的身家殷实的商人(称行商或洋商)开设,是特准的垄断对外贸易的商行。一方面公行行商享有垄断对外贸易的特权,代销外商进口商品,代办内地出口货物,从中获取厚利。另一方面公行行商要充当政府与外商之间的中间人,代外商缴纳进出口货物的税饷,承担一切中外交涉的传达,负责按清政府历次颁布的“防范夷人章程”的规定约束外商的行动。公行行商起了政府与外商间“所有争执的不可缺少的缓冲物”的作用。

其他,还有对出口货物的种类、数量的限制,对中国商人出海的限制,对海外贸易的商民和华侨的歧视等。

清政府采取严格的闭关政策之时,正值世界资本主义处于发展初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尚无大规模入侵中国的能力,而中国地大物博,有许多可供出口的产品。由于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的限制,使中国丧失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同时也妨碍了中外科学文化的交流,束缚了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闭关政策又是清政府对西方殖民者不断侵扰和日益严重的鸦片走私等活动所采取的防范措施,因而也具有民族自卫的性质。

闭关政策的限制和自然经济的抗拒,使得英国商品在中国市场上很难推销,而中国的茶、丝又是英国市场上的畅销货,输出量成倍增长,这就使中国在对外贸易中长期处于出超的地位。如1781—1790年的十年间,中国输往英国的茶叶总值为9600多万银元,而1781—1793年的13年间,英国输入中国的货物总值仅为1600多万银元,只及茶叶总值的1/6。英国资产阶级不得不每年运来几百万银元,以购买他们所需要的茶、丝和其他土特产品。这种正常贸易的状况显然不符合英国资产阶级侵略与掠夺中国的要求。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扭转对华贸易上的逆差,英国侵略者曾企图用外交谈判方式来冲

击中国闭关政策,于1793年、1816年先后派遣马嘎尔尼为首的使团和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来华,向清政府提出增开商埠,取消公行制度,占有一块土地,驻使北京等侵略要求。在遭到拒绝后,便积极做战争准备。同时,英国商人找到了对他们最有利的特殊商品——鸦片,把它作为掠夺中国财富,打开中国大门的“敲门砖”。

## (二) 鸦片走私

鸦片俗称“大烟”,是用罂粟汁液熬制而成的麻醉性毒品。唐朝时(公元8世纪)作为药材由阿拉伯少量输入。到16世纪,窃据澳门的葡萄牙人首先从海外贩卖鸦片到中国,但鸦片输入量仍不大,1729年(雍正七年)以前每年不超过200箱。鸦片的大量输入是英国于1773年确立了向中国实行鸦片侵略政策开始的。

英国自18世纪20年代开始向中国贩运鸦片。17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征服了印度鸦片主要产地孟加拉地区。1773年第一任印度总督哈斯丁斯正式制定了对华鸦片政策。这一年东印度公司取得了鸦片专卖权,1797年又取得了鸦片制造权。这样,从强迫印度农民种植罂粟,到加工制造鸦片,直到在加尔各答市场公开拍卖给走私商人,都由东印度公司一手包揽垄断,然后由鸦片走私商人偷运进中国,于是输入中国的鸦片逐年增加。1773年以前每年不超过1000箱,到1800年增加为4570箱,1828年达到11154箱。到了1834年,“在鸦片贸易史上,标志着一个时代”,这一年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对华贸易就完全转到英国私人企业手里,英国鸦片贩子从此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开始了猖狂地向中国偷运鸦片的时期,鸦片输入量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增长,1834年为21885箱,1838年则激增为40200箱。1821—1839年鸦片输入总数达338497箱。

美国也从事罪恶的鸦片贸易。美国在华商人几乎没有不贩卖鸦片的。19世纪20年代的普金斯洋行和30年代的旗昌洋行都是美国在华的巨大贩毒组织。他们从土耳其等地贩运鸦片来华,其数量仅次于英国。这就决定了美国在禁烟运动和鸦片战争中一直与英国勾结在一起,充当英国的帮凶。

此外,俄国从19世纪30年代起,也自中亚向中国输入鸦片。

清政府早在1729年(雍正七年)颁发了第一道禁烟诏令,但没有禁止进口,鸦片仍按药材进口抽税。1800年(嘉庆五年)嘉庆皇帝降谕查禁从外洋输入鸦片和在国内种植罂粟,于是鸦片乃由合法贸易变为暗中偷运。以后,嘉庆帝三令五申,而鸦片输入却有增无减。1821年,道光帝(1782—1850)继位,又严申禁烟令:“凡洋船至粤,先令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才准开舱验货。其行商容隐,事后查出,加等治罪;开馆者议绞,贩卖者充军,吸食者杖徒。”以后又颁布一系列禁令,严立刑罚,但禁止愈严走私愈多,治罪愈重而吸食愈众。其重要原因是英美资产阶级无耻地坚持鸦片掠夺政策,千方百计地破坏中国的禁烟法令。

他们建立了一个鸦片武装走私网。1821年起,英国鸦片贩子在珠江口外的伶仃洋(零丁洋)建立走私据点,那里停泊着20多艘趸船,外国商船运来的鸦片先卸入趸船储存,并由兵船加以保护。他们又勾引广州的土棍开设店铺,暗中包售鸦片,这种黑店称

“大窑口”。中国烟贩到“大窑口”交付现银取得提货单,凭提单到趸船取货,由一种名叫“快蟹”“扒龙”的武装走私船,把鸦片从趸船运回广州“大窑口”,然后再偷运到内地“小窑口”,售卖到各城乡市镇。1832年后,英美鸦片贩子的走私活动更为猖獗,他们特制了一种装配重炮的鸦片飞剪船,在东南沿海一带明火执仗地直接从船上出售鸦片。

鸦片走私愈禁愈多的另一个原因是上自朝廷、下至吏胥兵弁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鸦片受贿集团。他们明里挂着禁烟的招牌,暗里收受贿赂、包庇纵容鸦片走私。负责缉私的地方官吏、兵弁是直接受贿者,他们靠着鸦片偷运贪污自肥。远在北京的一些朝臣直到皇帝,则通过送礼、办贡等各种形式,间接分润贿赂。马克思深刻地揭示说:“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事实上,越是严厉禁烟,贩运鸦片的利润越大。因此,一道道禁烟令不过是各级官员进行勒索不断提高要价的砝码而已,丝毫不能阻止鸦片的输入。

到19世纪30年代,烟毒已从东南沿海扩大到内地十几省,深入山西、陕西、盛京等腹地。据1835年估计,全国吸食鸦片的人数在200万以上。烟毒泛滥给中国社会带来严重的祸害。

首先,鸦片使人的体力日衰,精力日敝,意志萎靡,道德败坏,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嗜食鸦片者,大多是统治阶级及其依附者。鸦片战争前夕有人估计,在京官中有十分之一二,地方官中有十分之二三吸食鸦片。至于各衙门中吸食者更多,林则徐估计幕友、宫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文武官员在鸦片的侵蚀下,更加深了寄生性和腐朽性,吏治更加腐败,更加重了他们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以填其无底的欲壑,人民“竭其终岁之操作,不足以偿暗室之一灯”。特别是吸食鸦片的士兵,名为健卒,却失去了战斗力,造成了“兵弱”的严重危机。马克思愤怒地谴责说:“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

其次,鸦片流毒全国,使中国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由于鸦片输入激增,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造成了白银大量外流。在中英正常贸易中,即使在19世纪30年代,中国仍然每年出超,但英国资产阶级利用鸦片贸易扭转对华贸易的逆差。这样,白银的流向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由流入为流出。据估计,鸦片战争爆发前20年间,中国外流的白银不少于1亿元,每年平均约500万元,相当于当时中国社会白银流通总额的1/5。

大量白银外流导致银贵钱贱,劳动人民是最大的受害者。当时中国通用的货币是白银和制钱(圆形方孔的铜钱)。1821年前后,白银一两可换制钱1000文左右,1838年就涨到1600文上下。农民和手工业者将仅有的少量农副产品出售,只能换回制钱,而缴粮纳税则须折合成银两,因而他们的实际负担增加了60%。这样,白银外流愈多,劳动人民的生活就愈恶化。他们坚决要求严禁鸦片,是禁烟运动的动力和主力。

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的结果又造成城乡工商业凋敝,摧残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林则徐对著名商业区进行调查后说:“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一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

货？则一言以蔽之日‘鸦片烟而已矣’。”鸦片吸去了人们对一般商品的购买力，夺走了普通商人的生计，使本已停滞的社会经济更加衰败。再加上大地主、大官僚对银荒危机的转嫁和对土地的兼并，也严重损害中小地主和商人的利益。因此中小地主和中小商人要求禁烟的呼声日高。

再次，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银源枯竭，致使各省拖欠的赋税日多，清政府国库空虚，财政拮据，这使清政府的统治受到了威胁，因而不得不对禁烟问题认真考虑了。

总之，烟毒泛滥已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使得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民族矛盾日趋激化。

#### 四、林则徐与禁烟运动

鸦片大量走私给中国社会带来严重的祸害，劳动人民坚决要求禁烟。他们把罌粟叫作“妖花”，把外国人叫作“洋鬼”，称鸦片贩子为“老鼠”。广东是鸦片走私的中心，当地群众的反侵略情绪更高。1817年5月，广东香山县海边的渔民和疍户自发地组织起来，打死五个在当地兜售鸦片的美国烟贩。1838年12月12日，在广州商馆前的广场上清朝官员处决中国烟贩，遭到外国鸦片贩子的捣乱，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慨，上万群众自发地包围商馆，拆毁栅栏，用石头瓦块袭击商馆门窗，打击了这些破坏中国禁烟的“洋鬼子”的气焰，显示了劳动人民坚决要求禁烟的决心。

面对严重的鸦片侵略和人民群众强烈的禁烟要求，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一场要不要严禁鸦片的激烈的论争，并逐渐形成为弛禁和严禁两派。弛禁派以道光帝的亲信满洲贵族、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为代表，主张对鸦片侵略妥协，弛禁或者维持明禁暗运的现状，反映了贵族、官僚、地主、商人中与鸦片贸易直接有关的受贿集团、贩毒者和吸毒者的利益。禁烟派以湖广总督林则徐和鸿胪寺卿黄爵滋为代表，主张严禁鸦片，杜绝烟毒侵蚀，堵塞白银外流，反映了受鸦片泛滥之害的中小地主和商人的利益，并代表了具有民族自尊心的爱国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

1836年6月10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奏道光帝，提出弛禁论，开始了两派对鸦片问题的论争。许乃济奏请取消鸦片禁令，允许公开买卖；准许鸦片照药材纳税进口，但只许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只禁“文武员弁士子兵丁”吸食鸦片，民间吸食、贩卖和种植鸦片“一概勿论”。这种置烟毒害民害国于不顾的主张得到穆彰阿等的支持，赢得了中外鸦片烟贩和瘾君子们的一片喝彩声。广东已是“纷纷传布，贩食之徒无不欢欣鼓舞”。奉谕复奏的两广总督邓廷桢起初着眼于解决财政困难也表示赞同。这种害国害民的残忍主张立即遭到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朱崧和兵部给事中许球上疏严词驳斥，使喧嚣一时的弛禁论被迫收敛。

1838年6月2日，鸿胪寺卿黄爵滋见烟毒泛滥日益严重，向道光帝上《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第一次提出以死刑重治吸食者以抵制鸦片输入的严禁方案。他认为“夫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因此只要对吸食者处以严刑重法，限令在一年内戒绝，过期不戒者，平民处以死刑，官更加等治罪，“其子孙不准考试”，这样人人



戒烟了,鸦片则不禁自绝,“如是则漏卮可塞,银价不致再昂”。这番建议是针对大批自己吸食而又包庇他人吸食、贩卖鸦片自肥的官吏而发的。道光帝把黄爵滋奏折发交各省将军督抚奏议,引起了关于鸦片问题的第二次大论争。10月间,各省督抚28人陆续复奏。弛禁派人多势众,反对黄爵滋的严禁主张。琦善在复奏中不敢明目张胆反对严禁,而是以明禁暗弛的主张破坏禁烟。他提出只要“不准通商”,鸦片就不可能进口,至于“内地已入之烟土,并不必缉捕销毁”,听任贩运吸食;对吸食者要“明慎用刑”,治以斩决是“断断乎不可行者”,应听任吸食者自己戒烟,待一年半载后,买不到鸦片也就自然戒掉了。琦善的主张表面上也要禁烟,实质上是维持鸦片走私,包庇贩毒、吸毒和受贿的官僚地主商人的利益。赞成黄爵滋主张的只有8人。其中湖广总督林则徐的复奏,对重治吸食者的主张大加赞许,而且作了重要补充。

**林则徐**(1785—1850) 字元抚,又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出身于下层封建知识分子家庭。1811年(嘉庆十六年)中进士,先后在浙江、江苏、陕西、湖北、河南等省任官,提倡经世之学,在任所采取“兴利除弊”的改革措施。他从外国的鸦片侵略中看到了鸦片流毒中华,造成“民穷”“兵弱”“银匱”的严重灾难,在湖广总督任内,就采取有效措施严厉禁烟,成绩显著。1838年10月遵旨奏议,递上《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支持黄爵滋的严禁主张,并进一步说明“重治吸食”挽救漏银,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存亡续绝的大问题,尖锐地指出:“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鸦片流毒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

清王朝面临财政枯竭的危险和军队瓦解的趋势,林则徐的话击中了要害,使游移于严禁与弛禁之间的道光皇帝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不能不倾向于严禁派,他想从禁止鸦片进口来解决根本问题。于是,两年前提出弛禁论的许乃济被降职惩戒,同年12月底林则徐奉旨抵京,道光帝连续召见八次,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赴广州查禁鸦片。这对弛禁派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但他们不肯罢休,伺机构陷,破坏禁烟。在林则徐应诏北上,途径直隶安肃(1914年改为徐水)时,琦善赶来对林则徐威胁说“无启边衅”。在道光帝接连召见林则徐时,穆彰阿“朝罢,与同僚论不合中外交构。有识者已为文忠危”。

林则徐明知身蹈危机,但置祸福荣辱于度外,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奔赴禁烟斗争的前哨广州。这标志着禁烟方针从“必先重治吸食”转移到“先以断绝鸦片为首务”,向着反抗外国鸦片侵略的方向转变。两广总督邓廷桢也从自己的经历中深感弛禁是无济于大局的。他写信给南下途中的林则徐,表示愿和林则徐“合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从此邓廷桢成为林则徐的一个得力助手。

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看到广州人民反鸦片侵略的高昂斗志,很受鼓舞,立即与两广总督邓廷桢等合作,雷厉风行地开展反抗外国鸦片侵略的禁烟运动,一面加紧整饬海防,惩治受贿官弁,严拿烟贩,一面于3月18日传集行商,斥责他们“平日串通奸夷,私心向外”,要他们把勒令外商缴烟具结的谕帖,立即传达给外商,限三天内将趸船鸦